

1956年8月24日，毛泽东同中国音乐家协会负责人谈话，此次谈话记录经整理后于1979年9月9日首次在《人民日报》以《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为题公开发表。《谈话》表面聚焦于音乐艺术，实则深刻触及了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如何处理中西文化关系、普遍性与特殊性矛盾、传统与现代接轨等根本性问题，同时广涉哲学、政治、经济、科学及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等诸多领域。《谈话》并未止步于对中西文化的比较以及具体艺术形式的讨论，而是立足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和人类文明发展的需要，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创造性地运用于文化领域，不仅为中国新文化的构建指明方法论原则，更重要的是对“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深层次思考，是一篇蕴含丰富马克思主义哲学智慧的重要文献。

一、历史语境：在“古今中西”的碰撞中寻找道路

理解这篇《谈话》，必须将其置于特定的历史坐标中。195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初步巩固了政权，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党的八大提出“我们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这意味着工作的重心正在向经济建设与文化建设转移。

与此同时，在文化领域，存在着两种相互交织的焦虑。一种是对于民族文化传统的虚无主义态度，片面认为西方的一切都是先进的，中国的一切都是落后的，主张全盘西化。另一种是狭隘的保守主义倾向，拒绝接受外来优秀文化，将民族形式绝对化。“全盘西化，有人提倡过，但是行不通”“过去有人搞八股文章，搞了五六百年。形式到处一样就不好”，这两种倾向都无法承担起建设“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新文化的责任。毛泽东的谈话，正是为了回应这一时代课题，旨在打破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思维。

二、核心要义：文化发展的辩证统一关系

在对立中把握统一，在统一中认识对立

——毛泽东《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关于文化发展的辩证法与实践智慧

■ 浦小松

《谈话》从艺术问题入手，升华为关于文化发展普遍规律的深刻论述。其所阐释的“普遍与特殊”“学习与创造”“传统与现代”的辩证关系共同构成了毛泽东文化发展观的理论基石，形成了一种既符合马克思主义原理又极具中国特色的文化实践哲学。

(一)普遍真理与民族形式的统一

毛泽东首先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高度切入。他指出，“艺术的基本原理有其共同性”，如同“水是怎么构成的，人是猿猴的，世界各国都是相同的”这一科学真理具有普遍性一样，音乐中的基本原理（如节奏、和声）也是共通的。这体现了矛盾的普遍性原理。承认这种普遍性，是学习一切外国好东西的理论前提。

然而，他紧接着强调，“艺术离不开人民的习惯、感情以至语言，离不开民族的历史发展”。这是矛盾的特殊性原理在文化上的体现，普遍的原理必须通过特殊的民族形式来展现。他以“一棵树的叶子，看上去是大体相同的，但仔细一看，每片叶子都有不同”的生动比喻说明社会主义文化的共性，必须通过丰富多彩的民族个性来体现。因此，他提出“社会主义的内容，民族的形式”这一基本原则，其精髓在于：内容决定方向，是进步的、革命的；形式服务于内容，但必须是人民喜闻乐见的、具有中国气派的。这种统一不是机械的拼凑，而是有机的化合，是普遍真在特定社会历史土壤中的具体实现。

(二)“学”与“化”的统一

对于如何学习外国文化，毛泽东提出了“学”而后“化”的辩证过程。他主张要大胆地学，“要把外国的好东西都学到”，把学的东西中国化。这种学习不是盲目的崇拜，而是建立在清醒认识普遍规律基础上的主动汲取。他特别指出，

“近代文化，外国比我们高，要承认这一点”。

但学习的目的不是创造，而创造的关键在于“化”。毛泽东用“半瓶醋是不行的，要使两个半瓶醋变成两个‘一瓶醋’”的比喻来说明这个过程，譬如如学习外国乐器，可以先用它来演奏中国曲子，这是一个初步的结合；但更深层次的“化”，是要以外国的好东西为参照，来改进和发扬中国自己的东西，最终创造出一种既吸收外来优点、又保有自身特色的新艺术。这个过程，类似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将普遍原理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产生新的理论飞跃。“学”是量的积累，“化”是质的升华，只学不化，会沦为模仿和依附；不学而淡化，则是闭门造车、停滞不前。

(三)传统与现代的统一

毛泽东思考传统与现代关系的逻辑起点，是打破将传统视为僵化、封闭客体的形而上学观点，文化传统，就其本质而言，是特定民族在漫长历史实践中形成并不断演化的“民族形式”与“人民性格”的结晶。毛泽东认为，“无论东方西方，各民族都要有自己的东西”“把老传统丢掉，人家会说是卖国，要砍也砍不断，没有办法”。基于这一本体论认识，对待传统的首要态度不是顶礼膜拜或全盘抛弃，而是将其置于当代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洪流中加以审视和激活。传统与现代接轨的“轨道”，正是亿万人民正在进行的社会生活与实践。

毛泽东指出：“中国的面貌，无论是政治、经济、文化都不应该是旧的，都应该改变，但中国的特点要保存。”他强调了吸收传统，不是为了复古，而是为了古为今用，是为了创造出属于这个时代的、新的东西。“保存”不是抱残守缺，故步自封，其深层含义是“以我为主”。变革的根基必须深扎于中国的历史与现实的土壤之中，失

去特点的“改变”，最终会因脱离实际、脱离人民而失败。“改变”不是“他化”，而是“我之新生”。中华人民共和国在政治、经济、文化上都是崭新的，但其灵魂与血脉依然是中国的。现代的政治制度、经济模式和文化形式必须经过“民族化”的改造，穿上“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的外衣，才能真正在中国落地生根。

三、理论超越：对教条主义与虚无主义的双重扬弃

《谈话》的深刻之处在于它对当时盛行的两种错误思潮进行了理论上的扬弃，既反对全盘接受，也反对全盘否定，这一扬弃过程的终极指向，正揭示了文化发展的核心智慧：文化的生命力，并非源于对某种纯粹性的坚守，亦非来自对异质元素的简单挪借，而是永远存在于开放包容的实践与扎根大地的创造之中。

它批判了对待马克思主义和外国经验的教条主义，不能奉行“拿来主义”，指望照搬某种现成模式即可成功。毛泽东明确指出，“搬要搬一些，但要以自己的东西为主”。他反对“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简单划分，认为“体”和“用”是辩证的，学习外国最终是为了壮大中国自身，正如毛泽东在《谈话》中用“学外国织帽子的方法，要组织中国的帽子”所作的比喻一样。这体现了实践优先的哲学思想：理论（包括外来文化的）的真理性与价值，最终要由中国的具体实践来检验和选择。

同时，它也否定了民族虚无主义，《谈话》充分肯定了中国民族文化的独特价值和世界意义。毛泽东说，“中国的豆腐、豆芽菜、皮蛋、北京烤鸭是有特殊性的，别国比不上，可以国际化”。用这种朴素的类比，意在说明文化特殊性本身即是一种贡献。中国音乐有其独特的规律和魅力，不能因为西方交响乐的宏大而自我贬低。这

种文化自信，源于对矛盾特殊性的哲学把握，也源于对民族文化生命力的坚定信念。越是深入参与普遍交往，越需要坚守文化自信与民族精神的主体地位。

四、当代启示：全球化时代文化自信的方法论

《谈话》的价值，不仅在于其历史性地指导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文化建设工作，更在于它为我们提供了在开放中保持主体性的文化发展战略。面对汹涌而来的外来文化，一味排斥或全盘接纳都是不可取的。正确的态度是，以我为主、为我所用，在广泛吸收人类一切优秀文明成果的基础上，进行自主的、创造性的转化与发展。这正是一种文化自信的体现——自信不是故步自封，而是敢于在广阔的天地中博采众长，并最终熔铸成为自己的新成果。它启示我们，真正的普遍性恰恰在于对特殊性的尊重与创造性解决之中。无论是科技、经济还是文化领域的创新，都必须紧密结合中国的国情、民情（特殊性），只有这样，创新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才能具有坚实的根基和蓬勃的活力。

此外，毛泽东在分析问题时展现的辩证统一思维方式，根植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核心，又在中国的革命与建设实践中淬炼成型。这种思维方式强调在对立中把握统一、在统一中认识对立，将矛盾视为事物发展的根本动力。它作为一种科学的方法论，其生命力在于直面现实的复杂性，在于破解发展中的两难命题。对于行进在复兴路上的中华民族，它是理解中国式现代化内在逻辑的思想钥匙；对于在充满不确定性的世界中探寻自身道路的后发民族与国家，它则提供了一种不屈服于任何教条、始终坚持从自身实际出发的智慧与勇气。

（作者单位：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

数字化赋能红色文化价值实现的逻辑与路径

■ 杜敦科 鲁晓慧

2024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十七次集体学习时强调指出：“探索文化和科技融合的有效机制，实现文化建设数字化赋能、信息化转型，把文化资源优势转化为文化发展优势。”数字化技术在红色文化保护、利用及传播中的应用前景十分广泛。依靠数字化赋能，红色文化的价值开发潜力巨大，信息传播更加快捷高效，不仅改变红色文化的存在形态，还深刻影响社会大众的学习模式，改变社会大众对红色文化的理解和接受习惯。

一、数字化助推红色文化价值实现的内在逻辑

数字技术是红色文化发展繁荣的新质生产力，数字化带动了红色文化传播场域、传播形态和传播方式的变革与重构。数字化拓展了文化空间，便捷了交流渠道，重塑了文化受众群体，同时也推动了数字化产品的创新涌流。

(一)数字化是红色文化应用传播的时代特征

当前，数字化技术已经渗透到人类生活的各个角落，人类社会已经进入数字化时代。近年来，国内数字产品和服务市场规模逐年增大，数字经济快速增长，中国网民的总量达10.7亿之多，青少年网民接近2亿人。数字化技术与文化产业融合发展代表了未来文化领域发展的新潮流。在这一时代背景下，红色文化也在技术变革中实现了与“数字+”的融合，呈现出具有时代气息的新形态、新产品。无论是面向社会大众的云端纪念馆、VR红色全景展馆、红色影视、红色网游，还是专业性的红色资源数字平台、党性教育平台等，都是数字化影响下的产物。红色文化从形成时期以物态形式存在，因其不可再生性和持续衰退性而影响着其使用价值，到数字化技术运用实现了保护的托底，同时部分地解决了保护与利用的矛盾。

红色文化的数字化具备了信息产品便捷、高效、精准、兼容等优势，满足了分众化、精准化的产品供给需求，在形式上也符合网络“原生居民”的文化消费模式。总之，数字化传播是红色文化价值实现的新形式、新特征。

(二)数字化推动红色文化形象创新、体验创新

数字化技术在红色文化加工、展示、传播中的应用是红色文化的再创作。作为一件新的文化作品，它脱胎于红色文化的母题，具有不可改写的红色基因。同时，它也尽收网络空间的特色，以时代化的形象展示给社会大众。数字化以其可编辑、修改、完善的技术优势，赋予红色文化新的“颜值”，也增强其吸引力和感染力，真正实现了“让收藏在博物馆里的文物、陈列在广袤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

后，而且在表现形式和价值传播上更胜一筹。这就需要在数字产品的创作和应用上坚持质量优先，以高质量赢得高流量。

在技术层面，应创新“互联网+”红色文化的传播利用模式，通过虚拟现实、增强现实、混合现实技术实现红色资源数字化和可及化。在形式层面，应通过短视频、动漫、网游等形式，打造更多具有穿透力的文化IP，呈现更多具有时代气息、自带流量的新形态、新产品，通过让红色文化活起来、潮起来，实现红色文化感染力、吸引力提升。

(三)受众群与多样态的精准适配

无论线上还是线下，红色文化传播都要把握教育规律，凸显受众主体性和可及性。数字化背景下，红色文化传播应与不同受众的特点相吻合，开展分众化、精准化教育。重视对受众进行分类研究，开展针对性分析，做到教育对象分众化、教育内容分众化、教育方法分众化。在此基础上，对红色文化进行基因解码、重构转化，最终实现智能化、高效率的数字应用。

多样性就是在数字产品的开发中充分考虑受众的年龄、职业、文化程度等因素，创造符合不同受众的应用场景和学习空间，真正靠实力抓住受众心理。文化传播实践证明，受众在传播中居于核心地位，受众对传播内容、形式、过程及效果均产生重要影响。文化传播应重视受众与传播者之间的交换原则，激发受众参与性和创意性，提升数字产品品质，将网络原住民留在红色文化创意空间。

(四)重保护与强利用的协调联动

数字化激活了红色文化的创新应用活力，拓展了红色文化价值利用效率，是智能时代传承弘扬红色文化的主要渠道。在对红色文化进行数字化升级改造的同时，我们应重视加强对其本源性资源的保护与研究，科学阐释红色文化中蕴含的基因与时代价值，坚持理实结合，避免红色文化利用的空壳化、无根化。一要重视红色文化内容和价值的挖掘，红色资源是传承红色基因的载体和依托，红色文化数字传播的前提是把红色资源保护好、整理好、开发好。打动人心的事实是最有说服力的证据。只有从专业的视角对红色资源进行研究和阐释，还原历史过程、丰富历史场景，才能为红色文化数字传播提供源源不断的素材和资源。二要重视对红色文化数字传播不能由AI包办，而要由既懂数字技术又有红色文化专长的专业人才承担。要聚焦红色文化产业发展需求，加快数字技术人才培养，推动教育链、人才链、创新链深度融合。

基金项目：枣庄市哲学社会科学“揭榜挂帅”项目“淮海经济区红色文化产业协同开发路径研究”（项目编号：SKFNLX202505）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枣庄学院）

论恩格斯对无产阶级诗人维尔特的评价

■ 易鑫

恩格斯高度评价诗人维 尔特 (Georg Weerth, 1822 年-1856 年)，强调文艺批评的情感尺度与审美特性，他认为：“维尔特之所以是一个大师，他之所以超过海涅（因为他是更健康和更真诚的），而且在德国文学中仅次于歌德，其原因是在于表现了自然的、健康的感受和热情。”这一评价体现了恩格斯评价文艺作品时强调的“美学观点”，而“无产阶级第一位也是最重要的诗人”的高度称赞，则体现了评价文艺作品的“历史观点”。在恩格斯那里，这两种评价文艺作品标准如何统一？本文以为，仅仅结合恩格斯评论的文艺作品研究显然不够充分，还应从恩格斯与当时德国文学中的“青年德意志”等具有资产阶级倾向作家的复杂关系展开，并重点结合恩格斯对维尔特作品的解读入手，促进对恩格斯文艺批评中无产阶级立场的理解。

一、维尔特生平简介

作为被恩格斯称为德国历史上无产阶级第一位也是最重要诗人的维尔特，1822 年出生在德国的德特莫尔德。其具体生平，恩格斯在 1883 年提到：“他于 200 年前的 1822 年 2 月 17 日来到这个世界。1843 年，当我在曼彻斯特时，维尔特来到布拉德福德，为他的德国公司做代理人，我们一起度过了许多愉快的周末。1845 年，马克思和我住在布鲁塞尔时，维尔特接管了他的公司的大陆代理机构，并安排了一些事情，以便他也可以将布鲁塞尔作为他的总部。1848 年 3 月革命后，我们都在科隆聚会，创办了《新莱茵报》。”维尔特接手了报纸小品栏，在恩格斯看来，没有其他报纸刊载过如此有力而幽默的文章。

1836 年，维尔特开始商业学徒生涯，第二年到英国工业城市布拉德福德一家精纺公司担任通讯员，并在此结识了恩格斯。通过与恩格斯的交往以及亲身观察，维尔特了解到比德国更先进的英国资本主义，并且了解到当时英国有组织的无产阶级斗争。与当时正在研究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的恩格斯一样，维尔特看到了纺织工人经历的压迫和苦难，并且也认同了当时已经具有阶级意识的无产者们。通过恩格斯介绍，维尔特早期了解了早期社会主义思想和英国工人运动领导人，并且在 1845 年与马克思认识。1856 年，维尔特因黄热病与脑炎逝世，马克思对此深感悲痛，“我们亲爱的朋友维尔特不幸在海地逝世，这是一个不可弥补的损失。”

二、维尔特诗歌的无产阶级意识

1883 年，恩格斯在整理马克思遗稿时发现了维尔特的诗作《帮工之歌》（德语原文为包含五首作品的组诗，马恩全集中对应译本为其中之一的《樱花盛开的时节》），并撰写了一篇回忆文章《格奥尔格·维尔特》，发表在当年的《社会民主党人报》。恩格斯对维尔特的无产阶级诗歌作品做出了积极的评价：“的确，他的社会主义的和政治的诗作，在独创性、俏皮方面，尤其在火一般的热情方面，都大大超过弗莱里格拉特的诗作。他常常利用海涅的形式，但仅仅是为了以完全独创的、别具只眼的内容来充实这个形式。”在这里，我们有充分理由欣赏一下维尔特这篇名作《帮工之歌》：

樱花盛开的时节，/我们找到了安身处，/樱花盛开的时节，/我们住到了法兰克福。/饭馆老板对我们说：“你们的穿着真难看！”/“你讨债的老板，这跟你有什么相干！”/“把你白酒给我们拿来，把你的啤酒给我们拿来，白酒和啤酒之外，再端来烤肉当菜！”/酒桶龙头像雄鸡啼唱，酒也流得哗啦响。/我们喝了一口，味道同小便一样。/老板端来一只兔子，配上芹菜，对着这只死兔子，我们怕得厉害。/当我们躺在床上，作完我们的晚祷，床上的臭虫就爬出来，直把我们咬到天亮。/这发生在法兰克福，在那美丽的城里，谁住在那儿吃过苦，谁就知道得清清楚楚。

早在 1845 年，维尔特在短篇《英国工人的花卉节》中，对于工人阶级的描述已并非那种困顿不堪的形象，而是自信的无产者形象。可以说，维尔特这种描述在德国文学中，第一次从战斗的无产阶级经验中塑造了一种新人物形象：工人是有阶级意识的，而且，他们也是

具有鲜明审美意识的战斗者。其中，维尔特在短篇结尾写道：

“是的，诗人的节日！——为了英国工人的花卉节……之所以更重要，是因为它从人民中萌芽，除此以外没有任何别的原因。这证明，工人除了在政治上发展之外，在他们的心中还保留着对自然强烈的热爱，这种热爱是一切诗歌的源泉，有朝一日将使他们能够将一种新的文学、一种新的、强大的艺术推向世界。”凭借从历史唯物主义立场出发的理解，维尔特形象地捕捉到了无产阶级作为勤奋的、战斗的、具有审美能力的历史主人公意识。

另一方面，与《英国工人的花卉节》一样，维尔特诗歌超越了对苦难的描写，展示了具有无产阶级意识自觉的工人阶级，以及他们的人性和力量彰显。在诗歌《他们坐在长凳上》中，维尔特讲述了当时英国工人对德国西里西亚织工起义的呼应，诗歌结尾仿佛是维尔特代表英国工人在为西里西亚织工大声欢呼：“祝你好运，西里西亚！”“禁不住热泪盈眶，/这些刚强的汉子，/拍案而起，慷慨激昂。/紧握拳头，挥动帽子，/他们全都义愤填膺，森林和草原同时响起；/西里西亚，祝你成功。”在生动叙述中，维尔特描绘了自信的无产者在尽情享受这一天，同时又以国际主义者的视角理解他们与西里西亚织工的共同事业。关于这两首诗，涉及到的主人公都属于当时欧洲冉冉升起的无产阶级革命力量——德国的西里西亚织工和英国工人群体。为了突出工人阶级的自主精神，维尔特从充满战斗精神的无产阶级角度来诗意地呈现，并且从诗歌表达方式可以看到，走上世界历史舞台的无产阶级工人已经意识到自己的力量和最终胜利。对于维尔特这种风格的作品，在文学形式与展现方式层面，恩格斯的评价十分中肯，“他的社会主义的和政治的诗作，在独创性、俏皮方面，尤其在火一般的热情方面，都大大超过弗莱里格拉特的诗作。他常常利用海涅的形式，但仅仅是为了以完全独创的、别具只眼的内容来充实这个形式。”

而为了突出维尔特的无产阶级立场与政治倾向，恩格斯将其与当时另一位德国诗人弗莱里格拉特（1810 年-1876 年）相对比。在恩格斯看来，“维尔特的所有作品和道貌岸然的弗莱里格拉特相反，都是讽刺性的幽默的。”可见，这可以看作后来恩格斯在评价文艺作品时概括出“美学观点和历史观点”的初步探索，体现了对文学审美层面的重视。在这里尤其突出的是马克思对文艺批评的“美学观点”，即革命导师在阅读文艺作品时首先考虑的是“审美体验”与“审美情感”，以此证明马克思与恩格斯对于文艺作品中体现人性之美的肯定与重视。从这里可以归纳出马克思主义文论的核心特征之一，即人作为阅读主体在欣赏文艺作品时的审美情感与体验。同时，也需要突出文艺作品的倾向性，通过恩格斯对维尔特的高度评价与称赞，可以看出，在马克思主义创立者那里，坚定的无产阶级立场与政治倾向才是他们肯定和倡导的。

三、结论

恩格斯认为，维尔特长期深入到群众中，“在工人群众中交了很多朋友”，“亲眼看到过工人群众的状况”。可见，对于文艺作品的广泛阅读与深入思考，与恩格斯的理论探索密切相关。毕竟，马克思与恩格斯都亲自关注 19 世纪早期与中期欧洲的社会主义运动及工人阶级的斗争。两位革命导师看到，正是在现实斗争中，无产阶级的力量不断发展壮大，反抗封建压迫与资本主义剥削，成为非常革命的力量。工人阶级自我意识也在斗争中觉醒，工人阶级开始意识到自身的历史地位和使命。而维尔特作品中鲜明呈现的无产阶级立场，正是对当时社会现实状况的文艺反映。以历史唯物主义视域来看，作为社会意识形态的维尔特作品正是对当时欧洲的社会存在（工人阶级的革命斗争）的能动反映，因此受到马克思与恩格斯的高度称赞，为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提供了重要的作品参照。

基金项目：云南省教育厅科学基金项目“恩格斯与‘青年德意志’派文艺论战研究”（项目编号：2023J0984）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玉溪师范学院文学院）

数字技术赋能与现实破局：农村养老产业转型的双重路径

■ 朱颖祺

二、现实瓶颈：技术落地的“卡点”